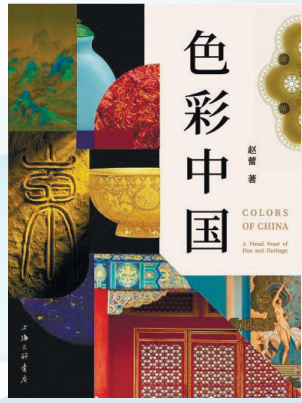




摘自《色彩中国》，赵蕾著，上海三联出版社 2026 年 8 月出版。

五色指的是青、赤、黄、白、黑，合称五正色，简称五色、正色。它们是组成一切色象的基本色。传统五色系统中的青、赤、黄、白、黑同现代色彩学中的蓝、红、黄、白、黑有差别。五色各有名分：青为首，赤为荣，黄为主，白为本，黑为终。首是先导，荣是华彩，主是总管，本是根基，终是归宿。五色以黄色居中，称中黄，最为高贵，它是王权的象征，古代中华帝国的标志。五色在中国古代因其尊贵而合乎礼仪的象征意义被运用在方方面面，不仅服饰制度要依照五色为尊，器物、建筑、居住装潢，甚至绘画都受到正五色的影响。

没有分类的世界一片混沌，宇宙分类是宇宙秩序化的一种需要，宇宙分类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并把握宇宙万物。“分类”是世界规律存在的方式。中国古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按照自己的体验想象和观察，将复杂的万事万物区别为“类”，以总体的思维加以控制和把握。在秦汉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人们慢慢形成了包括“阴阳五行”在内的宇宙分类方式，其中包括对宇宙的二分(阴阳)、四分(四方)、五分(五行)、八分(八卦)、九分(九宫)、十二分(十二月令)、二十四分(二十四节气)。“阴阳、五行”是影响最大的两种分类方式。世界万物划分为五类：金、木、水、火、土是其根本属性，色彩也被划分为五类，即五色：青、赤、黄、白、黑，正五色与五行——木、火、金、水、土相对应。五色挂靠木、火、土、金、水五行，形成木青、火赤、土黄、金白、水黑的五行色。青挂靠木，因为草木的颜色青翠，春季发芽的杨柳色，被称为青色。赤挂靠火，因为火的颜色发赤，代表南方和象征诚意与礼仪。黄挂靠土，因为中原地域的土壤颜色发黄。中国的黄土地带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以陕西、山西、河南三省最为典型。这三个省份是尧、舜、禹和夏、商、周、秦、汉的发祥地，也是五行学定型的地区，这片黄色土地区域是中国大地的标志。白挂靠金，同白银有关。金属分为三等：黄金、白银、赤铜，加上青锡与黑铁，组成五金。黄金的黄是土的标志色，赤铜的赤是火的标志色，五行家用白银的颜色作为金的替身。黑挂靠水，由于水的五行方位对应北方，阴暗而发黑。水来自天空，天色玄，玄是黑的近义词。五行五色理论是世界上最早的色彩体系，这种色彩观与“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宇宙一体化的中国传统观念密不可分，冬去春来，四季往复，“五色”结合生百色，“五行”结合生百物。1995 年 10 月，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的东汉末至魏晋时期墓葬，出土了嵌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锦，该织锦由

# 中国五色与五行

宝蓝、绛红、草绿、明黄、白五种颜色分别起花，织出星、云气、孔雀、仙鹤、辟邪、老虎纹样，给人以神奇之感。该织锦采用的五色，均为植物染料所得。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而该织锦采用的五色分别与五星一一对应，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酣畅淋漓。

五行思想认为万物以五种元素相互循环而成，也适用于方位的对应：东、西、南、北、中。五方与五色对应：东是青、西是白、南是赤、北是黑、中央为黄色。青、赤、黄、白、黑同五方对应，形成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的固定组合，称为五方正色，简称方色。

五方正色的功能在于识别方位、分清阴阳和尊卑。中国的地图方位对应五方：东方是太阳升起之处，西方有山脉连绵，南方热、北方冷，中央则是黄色的黄土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色彩与方位之间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并融入了自然观察与哲学思想。青色象征着东方，又称“青方”。古人相信，立春后东风送暖，草木萌发，大地逐渐披上青翠的衣裳。赤色则与南方相呼应，由于我国地处北半球，建筑多取坐北朝南的格局以纳阳光。南方作为日照最为充沛的方位，太阳因此得名“朱阳”“赤日”或“红日”，所以南方也被称作“赤方”或“赤位”。黄色代表着中央与土地，是尊贵的象征。古代帝王常在宫殿中使用黄色，如黄漆、黄砖与黄瓦，而代行天子权力的官员，则常被称为“黄衣使者”。西方在五行中属金，我国西部雪山连绵，且历史上多产白色珍兽，因此西方与白色相关联，其天神称“太白”，神兽则为“白虎”。北方与黑色相对应。古人以日影测定方位，正午时分日影直指正北，因阳光为赤、投影为暗，故北方被视为玄黑之方。早在周朝初年，周公营建洛邑后，乃建大社于国中，便严格遵循五方正色的礼制：东方覆青土，南方铺赤土，西方填白土，北方堆黑土，而中央则用黄土，形成了



完整的方位色彩体系。

五色系统的形成，源于中国先民对自然万物的观察、类比与附会。他们很早就发现，人的不同感官之间存在微妙的通联关系：例如，声音音高高低小进行组织，其效果就如同用五色组合构成纹饰；又如，赤色能唤起热感与喧闹感，而青绿色则带来冷感与宁静感。这种关联表明，视觉不仅能与听觉、味觉相通，还能与人的心态、性情相互呼应。正是通过这种感官之间的比照、联想与引申，五色系统构建起一个彼此关联的立体网状结构，并反过来深刻影响人们对色彩的感知。从殷商到春秋战国，描述色彩的语言日益丰富，大量颜色词的出现，标志着色彩辨识的种类越来越精细。面对纷繁的色彩世界，将其归纳、条理化成为必然趋势。对先秦文献的系统梳理显示，当时已能总结出 127 种颜色词。到了秦汉时期，色彩的辨别更为细致，至东汉以前，颜色词已激增至 348 个。人们根据字义，将这些词汇系统性地归入黑、白、青、赤、黄这五个大类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积累，到了汉魏时期，成熟的“五色”分类方式便最终得以确立。

## 周平王政权的秘密

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孙、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也就是说，《春秋》被认为是孔子的学识思想集大成之作，后世许多人奉“春秋大义”为法律的最高理论依据，赋予《春秋》类似宪法的法律地位。许多儒家学者真诚地相信，“春秋大义”真的能够让“天下乱臣贼子惧”。

但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重大问题是，如果孔子编订的《春秋》讲的真是“天子之事”，它为什么从不周平王元年开始写，而是忽略了东周王朝的前 48 年历史，改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写？要知道，在这 48 年里，鲁国经历了鲁孝公和鲁惠公两任国君，而且国内政局稳定，并未发生战乱。孔子晚年距离周平王还不到 3 个世纪，应该能够在鲁国和其他诸侯国找到不少周平王时代的史料，而他亲自编订的《春秋》为什么不追溯到周平王元年，或是至少追溯到鲁惠公元年（公元前 668 年）？

如今，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各类史料知道，如果一部东周的史书追溯到周平王元年或鲁惠公元年，那么“二王并立”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没法被掩盖了。如果孔子秉笔直书这段历史，读者会质疑，周平王政权是正统吗？或者说，东周王朝合法吗？

一旦周平王本人被怀疑是勾结西戎和叛乱诸侯，杀害周幽王、周携王、太子伯服，毁灭西周王朝的罪魁祸首，与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等人都属于典型的“乱臣贼子”，那么孔子构思和鼓吹的所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政治和社会主张就都毫无意义了，他总结的“春秋大义”不仅不能够让“天下乱臣贼子惧”，反而会让“天下乱臣贼子笑而从之”，事实恰恰正是如此。

关于《春秋》一书的写作过程和社会效果，《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过介绍和统计——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



摘自《裂周：青铜王朝的崩溃与重生》，罗三洋著，天地出版社 2026 年 5 月出版。

“二王并立”内战打到最后时，关中地区的西周王室直辖领地大多被西戎和秦人瓜分了，老周人遭受重创，多数幸存者只能向西戎或秦人臣服，或是迁往东方。作为“二王并立”内战的主要参与者，周平王、晋文侯和郑武公都是老周人的代表——姬姓贵族，这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局面。现在，他们在“王畿”地区的家族资产损失了大半，就连祖坟和宗庙也都荡然无存。很难想象，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起码的宗法信仰和道德良知的話，如何能够睡得着觉。

本来，周平王、晋文侯和郑武公这些人都只想通过“权力的游戏”夺取西周王朝的政权，但是通过二十多年看似足智多谋的操作，他们发现，自己把西周王朝彻底毁掉了，原先庞大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一小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就有许多事情需要向社会和子孙后代解释清楚。

传统上认为，东周王朝开始于公元前 770 年的“平王东迁”，但是孔子编订的编年史《春秋》却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即“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 722 年），为《春秋》作注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也都沿袭这种写作方式。这样一来，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723 年的东周头 48 年历史就没有得到儒家经典的细致讲述，只留下了一些很模糊的追述片段。

孔子高度重视他编订的《春秋》这本书，儒家经典《孟子·滕文公下》记载：“《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曰：“弗弗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又总结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教，人事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损贬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



摘自《酒香飘万里：“南海 I 号”船载酒罐与岭南酒文化》，李灶新著，岭南古籍出版社 2025 年 12 月出版。

本书是我在牵头策划举办“从广州出发——‘南海 I 号’与海上丝绸之路”“酒香飘四海——宋代广州公使酒库与中国酒文化”展览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整理南越国官署遗址考古资料的研究心得而成。

2019 年 2 月，我去拜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先生，就如何做好南越国官署遗址考古资料整理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李先生认为可以用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理论及方法，从广州、岭南、中国和世界等不同的视角来认识和审视遗址的核心价值和重要意义，这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此后，我在翻阅《南海 I 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 年发掘》时，发现“南海 I 号”沉船出土有大量酱釉罐，其中有些罐还戳有“酒罍”“玉液春”等与酒相关的印文，报告认为这是福建磁灶窑的产品。类似的酱釉罐在南越国官署遗址也有大量出土，据我多年来对古陶瓷的爱好研究和观察比对，我觉得“南海 I 号”的酱釉罐有些应该属于佛山南海奇石窑或文头岭窑的产品。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了李先生，为了慎重起见，他建议我联系香港中文大学黄慧怡老师和参与“南海 I 号”发掘的肖达顺先生，相互交流看法。通过对“南海 I 号”酱釉罐的胎釉、内壁、外底、肩部印文和印花等细节的观察，我进一步确信自己的判断。

同时，我通过整理南越国官署遗址历年考古资料，确认在遗址西北部发掘的一组宋代建筑基址为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迹，这里出土与“南海 I 号”相一致的酱釉罐也特别多，显示两个遗址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2021 年，“南海 I 号”沉船、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与南越文王墓，均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也是广东仅有的能获此殊荣的项目。然而，早在 800 多年前，二者已结下不解之缘。同年 8 月 13 日，我们一起去到奇石窑和文头岭窑进行实地踏查，采集到和“南海 I 号”高度相似的酱釉罐标本。我们从“南海 I 号”、南海诸窑、南越国官署遗址挑选一些标本，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凯锋教授团队进行成分检测分析，用科技考古的方法检验我们的研究结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南海 I 号”考古发掘领队崔勇先生听取我们的现场踏查汇报后，随即协调院里安排肖达顺领队到窑址现场进行考古调查和抢救性发掘。

2021 年 10 月 1 日，崔凯锋教授告诉我们检测结果：南越国官署遗址和“南海 I 号”大部分酱釉罐标本，同属于南海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的产品。窑址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出土一批与“南海 I 号”有相同印花或印文的酱釉罐标本。这都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无疑令人十分振奋。

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陆续公布和发表，《光明日报》编辑李韵女士主动联系我，希望我们能写一篇有关这次“南海 I 号”最新发现的知识普及型文章。2022 年 10 月 2 日，我和肖达顺、潘浩合作的《酒罐“商标”揭秘 800 多年前“南海 I 号”来过广州》在《光明日报》的“文化记忆”专栏上发表。为了向公众共享“南海 I 号”最新发现，我提议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策划举办专题展览，并得到了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龙家有，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广州市文物局局长刘晓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劼，南越王博物院院长李民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长黄海妍等领导的认可和大力支持，也得到了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澳门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佛山市博物馆、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深圳博物馆、深圳望野博物馆、惠州市博物馆、广州海事博物馆、雷州市博物馆、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九江双蒸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和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积极响应。2023 年 7 月 3 日，“从广州出发——‘南海 I 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开展；2024 年 9 月 13 日，“酒香飘四海——宋代广州公使酒库与中国酒文化”开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 南海 I 号酒罐中承载的中国酒文化